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SHILIAOXUE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

刘增杰 著

中西書局

刘增杰 著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

ZHONG GUO XIAN DAI WEN XUE SHI LIAO XUE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史科学 / 刘增杰著. —上海: 中西
书局, 2012. 3 (2012. 7 重印)

ISBN 978 - 7 - 5475 - 0350 - 8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 现代文学—
史科学—研究 IV. ①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3719 号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批准号: 09YJA751018)

河南大学文学院科研基金资助

中国现代文学史科学

刘增杰 著

责任编辑 张安庆 路征远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www. shwenyi. com)
中西书局(www. zxpress. com. 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875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75 - 0350 - 8/1 · 066

定 价 30.00 元

前 言

中国现代文学史科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分支学科,它以搜集、研究、编辑、运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为任务,力争把史料发生、运行的过程作初步的描述与阐释。中国现代文学史科学是一个大的范畴。它与中国现代文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考证学、辑佚学的内容既相互交叉,又具有自身相对独立的学术形态。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着力对现代史料的种种独特现象作抽样分析,以鲜明的价值立场,揭示史料百年发展的历史真相。已有的史料实践成果是研究的起点。

—

中国现代文学史科学包含两个关键词,即中国现代文学与史料学。这里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不是通常所指的1917年至1949年间的文学,它在时间跨度上有大的延伸,泛指19世纪末直至21世纪初百年文学运行的全过程。中国现代文学史科学把通常所指的晚清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视为一体,看作是一个具有内在连续性的历史流变。这一述史视野,拓展了由古典文学史科学向现代文学史科学过渡合理性阐释的巨大空间。史料学指的是对这一时段现代文学史料的整体审视与概括。

笔者认为,19世纪末是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在内的中国现代学术的转型期。在西方文化思想的冲击下,中国固有文化思想因为对

现实生活观照与解释能力的疲软而碰壁,从而促使一些早醒的知识者为民族文化的振兴别寻新路。新的与旧的学术思想、文学思想开始发生交锋。在对中国传统思想质疑、评判的过程中,现代观念逐渐引入,研究者的独立学术意识日益增强。谈到中国学术现代时期的起始问题,刘梦溪有过这样的描述:“清中叶的乾嘉汉学里面已经根藏有现代学术的一些因子,而发端则应该是在清末民初这段时期”,“至于发端的具体时间,似不好绝然化。1898年严复发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学》,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这些论著的学术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或开始倡言学术独立,强调学术本身的价值,或借鉴西方的哲学和美学观点诠释中国古代文学名著,传统学术的范围已经无法包容它们的治学内涵,说明中国学术的现代时期事实上开始了”,“诸种因素组成的合力向我们昭示,1898年至1905年前后这段时间,应该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时期”。^①他认为,中国现代学术由发端到结出较为丰满的果实,经过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五四”之前的将近20年的时间,基本上还是处于现代学术发展的准备期和交错期。我同意刘梦溪的这一学术判断。

总体上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和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是相生相伴的。从当时现代思潮的微波初起中,现代文学研究者也已经朦胧地感受到了它最早的萌动。

关键词史料学概念的确立则要困难得多。史料与史料学是两个概念,史料指的是史料本身,史料学则是要探讨史料的发生与发展规律。同样,文献与文献学的关系也基本如此。问题在于,在相当长的时段内,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等概念,像同义词一样被人们不加区分地作着替换性使用,

^①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第112、114页,三联书店2008年版。

从而模糊了史料与文献的疆界,进而也使史料学、文献学内涵的辨析出现了某些困难。这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发生期不可避免出现的幼稚现象。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成长于历史中。直到20世纪30年代,譬如,1935年至1936年出版的10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中,选编人在导言中涉及此问题时所使用的词语就仍然各式各样,带有一定的随意性。

胡适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建设理论集》导言中使用的是“史料”一词。他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是“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作第一次的史料大结集”,“理论的发生,宣传,争执,固然是史料,这七大册的小说,散文,诗,戏剧,也是同样重要的史料”。阿英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集,书名即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作者在《序例》中也主要使用“史料”一词。如说:“胡适后来发表的《逼上梁山》(1934《东方》1号),也都可以作为‘史料’的。”阿英还在书中提出史料的分类,如“会社史料”、“史料特辑”等。郑振铎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文学论争集》和茅盾编《小说一集》时,把使用的史料通称材料。郑伯奇则使用“文献”一词:“创造社是怎样成立的?我们且看创造社方面的文献。”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时,评论者也使用“文献”一词来概括大系的特色:“《大系》固然一方面要造成一部最大的‘选集’,但另一方面却有保存‘文献’的用意。”^①史料、材料(资料)、文献就这样一直交互使用着。直到20世纪80年代,事实上这几个词语仍在根据研究者的习惯使用着。马良春在《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②中,把史料分为七类,即专题性研究史料、工具性史料、叙事性史料、作品史料、传记性史料、文献史料、考辨性史料。他对文献史料的解释是:“包括实物的搜集、各类纪念活动的录音、录像等。”马良春在谈到

① 姚琪:《最近两大工程》,《文学》1935年7月第5卷第1期。

②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

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可能性时还强调,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陆续出现了大批热心于资料工作的人。在谈到热心资料工作的人之中,他称赞朱金顺是高等学校开设“史料学”专题课的代表,称赞朱金顺的《新文学资料引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一块基石”。在马良春使用的学术术语里,资料、史料也似是混用的。在朱金顺这部著作的具体论述中,资料、史料两词有时并用,全书使用较多的则是资料学概念。

仔细分辨还可以发现,一些研究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往往习惯于使用资料一词,到了80年代后期则多改用史料。比如樊骏,他在1989年《新文学史料》上发表长文《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①时就把“史料”冠于题目之中,以示对这一关键词的看重。此后他还强调:“在材料、资料之外,还有史料这个名称,可见这‘料’在历史研究中举足轻重的位置——没有史料,也就无历史研究可言。”^②

直到近年,人们在使用史料、文献概念时,也还有不加严格区分的混用。我就有过这样的情形。在2003年清华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研讨会的发言中,我使用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概念,可待整理发言内容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时,我又把史料学题目撤下,换成了另一个题目交卷。不料,编辑打来电话,建议还是恢复史料学那个题目。我当即又表示同意,用了《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学》这个题目。文章发表后,对于使用史料学还是使用文献学概念,我心里仍然犹疑不决。第二年,我写了另一篇讨论史料学的文章,发表时用的题目又是《报刊发展与现代文献

① 樊骏的《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作——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一文收入在他的著作《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时改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

② 樊骏:《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考察与思索》,《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学的创立——以师陀研究为例》。^① 据我考察,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仍不统一。不过,对研究对象用史料学命名的研究者开始增多。马良春提出《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②后,樊骏随后响应,认为“史料学的建立,将减少实践中的盲目性,提高工作的科学性,为史料工作的健康发展,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③ 严家炎则把樊骏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一文认定为“现代文学史料学这个分支学科的里程碑式的著作”。^④ 王风也说,现代文学“首先需要史料的发掘和整理,甚至也可以有我们的史料学”。^⑤ 王风在文章中还对史料、文献两个概念作了明确的区分。正在高校开设现代文学史料学课程的谢泳则说,“我不主张称‘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而主张课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主要是考虑中国现代文学还是一个发展的变化过程,虽然早期中国现代文学的相关活动已大体具备稳定性,但毕竟时间还不够长久,史料的积累还需要一个过程”。^⑥

目前,史料、文献两个词语互用、并用的现象仍继续存在。应该承认,每位研究者根据自己对概念的界定,只要论述的内在理路有其合理性,他们学术追求的表述方式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在漫长的实践过程中,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将会逐渐建构起符合学科内在逻辑的学科体系。

① 《长江学术》2006年1月第1期。

②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

③ 樊骏:《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23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④ 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序言》上册第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⑤ 王风:《现代文本的文献学问题——有关〈废名集〉整理的文与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⑥ 谢泳:《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文艺争鸣》2008年第7期。

二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体系是围绕着史料存在的新形态展开的。这里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新形态,实际是指它自己所拥有的新材料、新问题,并依此逐步形成自己的学术规范、学术流程,最终建立起体系性的知识架构。史料学新形态研究,要求对实践中出现的史料现象进行梳理和理论概括,期望把现象研究逐渐升华为历史研究。本书只是从自己的阅读经验出发,对个人接触的有限史料进行描述,建构自我主体想象的史料学空间,实现个人化的历史言说,而并不刻意追求结构的完善。

本书包括如下内容:一、源流篇: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发生与流变研究;二、形态篇:重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新形态研究;三、应用篇: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应用研究;四、史料研究家篇:百年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家研究。实际上,一、三、四也都是围绕着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现代形态问题展开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献或曰史料的研究成果丰厚,单是以中国文献学、中国文学文献学、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为书名的著作,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先后已经出版近百部,^①人们为什么还要另立门户,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这主要是由于出现了独立的史学新形态所确定的。

第一,需要进行适度的史料发生学的描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发生与流变研究不是详尽地书写史料学发展史,重在梳理百年史

^① 署名中国文献学、中国文学文献学、中国文学史料学的著作很多。早在1928年,郑鹤声、郑鹤春就写出了《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类著作的出版日渐增多。如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张大可、俞樟华的《中国文献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万刚主编的《中国古代文献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徐有富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曹道衡、刘跃进的《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5年版)等。

科学发展进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人物与事件,如分析史科学创立初期梁启超、鲁迅、胡适不可取代的奠基者的地位;与此同时,对各个时段涌现的史料研究者也给予相应的评价。这些努力意在揭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科学绝非一日之功。

第二,报、刊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主要载体的出现,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及其分支学科史科学的新面目。20世纪80年代以来网络创作与研究的出现,更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添加了新的内容。

文本修改本是应用篇要讨论的范畴,但鉴于现代文本演变的复杂性所引起的史料质的变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科学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或者说,对文本频繁地进行修改,构成了现代文学文本与古典文学文本的重要区别,所以,本书特别把文本修改部分列入形态篇进行评述。文体的变化也带来了史科学内容的变革。以长篇小说为例,古典文学的长篇小说数量相对较少,而进入现代时期以后,特别是近三十年来,长篇小说的数量激增。有的长篇小说篇幅浩大,甚至动辄以百万字计。一些长篇小说先在报刊连载,后由出版社出版。出版的版次也多有变化,造成了校勘任务的空前繁重。

第三,需要加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科学的应用研究。研究围绕目录、版本、校勘、考证、辨伪、辑佚等内容,描述中国现代文学史科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怎么脱胎而出,开拓出了一片新的研究天地。当然,所谓“新天地”、“脱胎而出”,都不过是对出现的某些新质的强调,如强化对网络文学史料的研究,等等。就应用研究的一些基本面而言,我赞同潘树广提出的古典文献学与现代史科学(或曰文献学)交融的见解。他说:“事实上,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两者虽有差异,但也有许多共通之处。”^①潘树广在这里讨论的显然是古典文献学内部的问题,但其精神对古典文学史科学与现代文学

^① 《前言》,见潘树广、黄镇伟、涂小马:《文献学纲要》第1—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史料学的研究却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本书原想研讨的一项内容,还包括史料学的理论研究,试图对百年来出现的某些影响较大的问题做出理性的解释。理论的活力在于它的现实品格。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不是一大堆史料的集合、拼凑。史料学应具有思想力和学术生命力。史料学理论建设的核心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问题,或者如巴金在《随想录》^①里用最简洁的语言所概括出来的“说真话”问题。巴金以自己 and 胡风交往的切身经历,说明在特定语境下坚持说真话的极端重要性以及无法兑现承诺的现实困难。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者,只有具有巴金提倡的说真话精神和学术良知,在研究中坚持“回到原初”的学术原则,把研究切入文学创作与文学史料原初的存在,触摸到当时作家的精神深处,逼近研究对象、拥抱研究对象,走出人云亦云、程式化的研究模式,才能够使研究日益接近理论形态。^②

以上几个方面的思考并不成熟。在众多无序的知识中,建立起有意义的逻辑关系绝非易事。目前,特别需要对史料研究现状进行深入反思。如一位研究者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我们曾多次指出,在古典文学研究由史料的整理向史料的解释大胆挺进的同时,现代文学(也许也应包括‘十七年’的文学)研究应该由史料的解释向史料的整理小心地回溯。——现代文学研究中史料文献问题愈来愈成为这个学科生命的泉源所在,离开了真实可信的史料文献:史料的匮乏、误解、曲解、割裂、藏匿、毁弃、篡改、编造等,现代文学研究的实证性将遭异变,历史本质将被阉割,她的科学价值便不复存在,学科生命也随之窒息。”他坚信,在今天的现代文学研究运作机制中,应该给予“史料以核心地位”。^③ 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

① 巴金:《怀念胡风》,《随想录》第885—886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② 参看拙作:《回到原初——解放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4期。

③ 《编后记》,《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

进行诚实的反思,正是推进史科学建设的真正动力。

实证研究是本书写作时采用的基本方法。由于史料薄弱引起的学术质量下降,促使人们开始对实证研究的关注。我赞赏陈思和等先生前些年在《复旦大学学报》对实证研究的倡导和身体力行。很明显,实证研究的要义是重证据,一切研究以坚实的史料为基础。充分掌握史料、证据,就是拥有研究的话语权,既能够摆脱对主观预想的过分期待,又可以理直气壮地对抗谎言。史料、数据本身就是一种言说,它的背后也许代替了许多不必直说或不宜直说的观点的表述。当然,今天的实证研究同样也要重视阐释,在史实前提下的阐释,从而把研究推向理论层面。由此,古老的实证研究将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冲破一切先验的妄说,而使研究成果处于学术前沿,具有无法更易的先锋性。不用说,实证研究也要防止经验型研究的限制和负面影响,立足于史料却时刻牢记向研究对象发出形而上的追问。对我来说,实证研究当然也只是一种向往。实践过程中我既感受到了实证研究的魅力,同时也格外品味到这种研究的艰辛。目前,许多文献史料尚未解密,在史料残缺的情景下形成完整的观点为时尚早。因而,我的研究当然没有建立体系的奢望,不追求认知结构的完整,只不过就几个自己感兴味的问题提供若干史实,平实地做一点事。所以,送交出版社时的书名,定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论稿》。使用“论稿”两字,原是为了强调写作内容的随意性,但出版社的编辑在审读完书稿后告诉我,简洁含蓄的书名更能凸显论述主题,因此诚恳建议将“论稿”两字删去。于是我也就接受了编辑的建议,把这本小册子改成了现在的名字。

三

本书的主体部分是多年教学札记的整理以及笔者发表的相关论文的整合。教学不刻意追求体系的完整性,而总想强调实用,让

青年人多了解一些相关的基础知识,有较多机会进行学术研究的初步训练。面对面与接受对象交流的随意性,使本书不像教科书那么严肃、完整,也使本书缺乏学术的谨严,文字风格也不一致。有些例子像是临时心血来潮的脱口而出;有的篇章又举例过多,观点被淹没于史料里;或者,例子不具备应有的学术意义。可以说,本书只是一份带有私人性质的、原不打算供更多人阅读的教学札记。现在整理出版,盼望得到同道和读者的指教。

不言而喻,史料学应该向读者提供较多的史料,如朱自清所说的“空冒无益,要有人先做出几个沉重的例子才行”!^①但人们当然同时也该牢记:史料学绝不是知识的堆积。我向往的原则是,书中所用史料,应以自己所感受、所发掘的新史料为主,以使书的面目稍有一点新鲜气息;但为了保持史料的稳定性、经典性,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对那些带有示范意义、曾经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史料,自己也并不格外避讳。

本书写作真正的难度,是缺少现成的体例可以遵循。困难带来的唯一机会,是可以避免融化在别人的影子里而自我消失。对我来说,史料研究从罗列史实走向真正的自主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刻,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提示的一个尖锐问题突然闪现脑际:“吾辈欲为将来之学术界造福耶?抑造罪耶?不可不取鉴前代得失以自策厉。”突然袭来的失落感,益发加重了心头隐隐涌动的焦虑。

2011年1月9日

^① 转引自徐葆耕:《重视“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蓝棣之、解志熙编:《远去的背影》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目 录

前 言	1
-----------	---

源 流 篇

第一章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起步：19世纪90年代至 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史料研究	3
第一节 由古典文学史料研究向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过渡	3
一 报刊研究的起始	4
二 白话文运动的推动	5
三 外国文学思潮的翻译与史料目录的介绍	7
四 胡适日记与《文学改良刍议》	9
五 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到来扫清思想障碍	12
第二节 “五四”至30年代中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	15
第二章 在曲折中行进：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的 史料研究	22
第一节 史料研究遭受重挫的年代	22
一 日军侵华战争：亘古未有的文化浩劫	22
二 历史变革进程中史料的流失	27
第二节 史料建设的新收获	28

一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出版与《新文学选集》的编纂	28
二 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	31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摧残	37

第三章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全方位的展开：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年的史料研究	43
第一节 由史料征集到学术创新	43
第二节 史料研究的整体推进	52
一 作家书信、日记研究	52
二 口述历史、回忆录、旧笔记研究	63
三 书话、档案及其他	71
四 部分史料编纂成果实录	75
第三节 脆弱的软肋：百年史料研究反思	78
第四节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呼之欲出	87

形 态 篇

第四章 现代报纸与期刊：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重要

载体	97
第一节 现代报刊的产生与发展	97
第二节 现代作家与文学期刊	98
第三节 文学期刊与文学史料	105
第四节 文化期刊中的文学史料——以《东方杂志》为例	109
第五节 报纸文学副刊上的文学史料	113

第五章 网络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

第一节 网络的发展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数字化建设	127
一 网络的产生与中国网络的发展	127

二	网络时代的学术研究·····	128
三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数字化建设·····	131
第二节	网络资源中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应用与鉴别·····	136
一	网络资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应用问题·····	136
二	网络资源中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鉴别问题·····	140
第六章	文本修改：与古典文学史料研究迥异的版本 问题·····	147
第一节	处于未完成状态的现代文学文本·····	147
第二节	现代文学文本的修改类型·····	150
一	从文字上对文本进行精益求精的修改·····	150
二	权力意志下的文本修改·····	152
三	作家思想变化与文本修改·····	154
四	“集体讨论”与文本修改·····	161
五	家属参与(整理者参与)文本修改的得失·····	163

应 用 篇

第七章	史料类型与书刊目录研究·····	169
第一节	史料类型的演进轨迹·····	169
第二节	目录编制的现代转型·····	175
第八章	版本、注释与校勘、考证·····	182
第一节	版本与注释·····	182
第二节	校勘与考证·····	187
一	校勘的成绩与面临的新问题·····	187
二	文字考释与田野调查的结合·····	192

第九章	辨伪与辑佚	199
第一节	辨伪：史料学研究的重要环节	199
第二节	辑佚空间的扩展	201
第十章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13
第一节	史料研究的薄弱来自理论的贫困	213
第二节	关于研究中运用西方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219
第三节	加强对涉及全局性史料的辨析	222

人 物 篇

第十一章	史料研究家叙录(一)	233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建设的先行者	233
第二节	梁启超：古典文学史料研究走向现代文学史料 研究的桥梁	235
一	系统总结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成绩，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 研究提供借鉴	236
二	“以科学的眼光”“重估”研究对象	241
三	关于史料研究面临诸种困境的警示	244
第三节	鲁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	245
一	起步于古典小说史料的整理	245
二	以批判性思维审视历史与现实，保持史料研究鲜明的 现实品格	248
三	强调保存史料与抢救史料	250
第四节	胡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	252
一	倡导“整理国故”：研究从古典文学史料整理开始	252
二	胡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	255
三	对于治学方法问题的关注	259